

XIANDAI SHEHUI XUE BI JIAO YAN JIU CONG SHU

# 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美] 格尔哈斯·伦斯基著  
关信平 陈宗显 谢晋宇 译 吴忠 校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XIANDAISHEHUIXUEBIJIAOYANJIUCONGSHU

# 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

〔美〕格尔哈斯·伦斯基 著

关信平 陈宗显 谢晋宇 译 吴忠 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

格尔哈特·伦斯基 著

关信平 陈宗显 谢晋宇 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3 1/32 印张15.5 字数354000 插页3 印数0001—85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 7-213-00177-9/C·12

统一书号：3103·296 定 价：4.20 元

## 编者的话

社会学，如果说在我国几年前还属于刚刚“复活”的新学科，如今可以说这一学科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进入了酝酿着重大突破和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学以其综合性的视野和独特的研究角度，使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社会学在学术界不断上升的地位，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多地应用，我国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或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或计划等等，就是明证。

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学，都在现实研究和理论思考两方面向更深入的层次发展，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生成新的理论，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比较借鉴。

这套“比较研究丛书”是借鉴的窗口；这里的“比较”，就是借鉴。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已是这套丛书的第三批了。通过这套系列丛书，我们将把经过选择的外国社会学著作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让人们在发展我国社会学的时候，对国外已有的成果有所了解，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一步开拓思维空间，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去攀登社会学发展的新高峰。

在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学科丛书林立的今天，《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已开始为广大读者所熟

悉。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成为这套丛书的批评家和赞助人，使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大家的读书和创作园地，伴随着中国社会学从“复活”走向发展成熟，为推进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学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九月改于北京

DN09/32  
10

## 译 序

本书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尔哈特·E·伦斯基（Gerhard E. Lenski）的一本代表作。本书初版于1966年，此中译本译自该书的1984年新版。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几千年来，许多学者们一直不懈地苦苦探索着社会不平等的本质、原因和后果，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而到了现代，由于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前所未有的复杂化，使得社会分层的问题更加尖锐、更加急迫地摆在了社会科学家们的面前。由于社会学的创立和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努力，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科学的层次。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更加复杂化，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了许多严重困扰着人类的社会问题。这就迫使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不得不将它做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来加以对付。因此，在现在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学中，社会分层都是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我国目前正进行着一场深入的改革运动，并经历着技术、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急剧变化。其结果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明显变化，能否有一个合理的

社会结构，能否随时注意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将是决定社会系统能否良性运转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改革能否全面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已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发展，我们翻译了这本在美国社会学界（特别是其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著作，以求他山之石之借鉴。

本书作者毕竟是西方社会学家，其书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肯定会有错误或不适用于我国情况之处，望诸读者明鉴。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漏错难免，也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关信平（新版序言、序言、第一、二、三、四、十、十一、十二、十三章）

陈宗显（第五、六、七章）

谢晋宇（第八、九章）

限于篇幅，我们在翻译中删去了书后的索引和大部分脚注。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和领导给予了我们支持和鼓励，“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编委会和浙江人民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翻译出版条件，在此一并致谢。

关信平

1987年10月

# 新版序言

自20年前《权力与特权》一书写成以来，在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中又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人们积累并分析了大量的新资料，引入了更为复杂的定量分析技术。同时，理论的视野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和其它一些进展，在这个新平装版出版之际，必须要问一下，从已发生的变化来看，《权力与特权》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遭遇如何。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不能自称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我也不能自称熟悉过去20年中所有相应的工作。然而，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在第2、3、4和第13章中所提出的一般理论，和从第5章到第12章所提出的各种特定的理论迄今为止都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虽然，如果我今天要重写此书的话，那我可能要加进一些新材料，并且可能要改变一些细节之处，但是，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东西能使我认为原书的基本理论是不健全的。在我看来，第458页上阐明的在各个常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本质上仍是正确的。并且，从这较为一般化的理论中所推出的各种特定的理论也是如此。

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自我夸耀的行为，但我相信，它是我在提出理论时所采用的综合方法论的一个结果。通过将理论建立在他人所铺垫的基础之上，又通过在理论建构中把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相结合，我将这些风险缩到了最小程度，并避免了许多通常的危险。



就每一个社会分层理论都会遇到的中心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而言，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料更容易得到了。这些社会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的试验基地。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未受到任何挑战的情形下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种建制结构，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要摧毁历史上的不平等模式，并取而代之地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在那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受苏联控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进行了相似的实验。没有哪个以严肃的态度去研究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者会忽略这些实验，或者不去深思它们的后果。

不幸的是，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对这些事情高度保密，使得甚至是关于这些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基本信息都几乎无法获得。革命后不久，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就被取缔了。在长期的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急剧恶化，越来越难以得到可靠的信息（英格尔斯，1950）。直到本世纪50年代，关于苏联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好的信息来源，都只是逃出来的逃亡者的报告（参看英格尔斯和鲍尔，1959）。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这一情况慢慢开始改善了。对小说家们的限制逐渐放松了。到了1956年，波兰的一些社会学家，如一直被软禁在家的斯坦尼斯诺·奥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也再度获准教学、写作和从事研究。到了我写作《权力和特权》的时候（1962—1965），相关材料的流量开始加速。一些小说，如弗兰第米尔·杜丁契夫的《不仅单靠面包》（1957）；亚里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邓尼索维奇

《生命的一天》（1963），和费多·阿布兰莫夫的《新生活》（1963）提供了比以前可得到的更深入得多的关于苏联生活的细节。波兰社会学家们（如斯蒂芬·诺瓦克，米查尔·波霍斯基，亚当·萨拉帕塔和维诺兹米尔茨·维索诺夫斯基）的书和文章首先提供了关于一个苏联类型的社会中层问题的系统的和定量的资料。

自6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的信息细流转为了一股洪流。在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期间，波兰社会学家们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波兰社会学家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通过许许多多的调查和其它研究，他们探索了〔社会〕流动的模式，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对精英的态度、关于社会平等的信仰、以及许多其它的主题。在这一期间，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学家们加入了这种努力，在有一小段时间中，捷克的社会学家也参加进来了。

由于他们的努力以及其它一些记者和小说家们的努力，我们今天比20年前更多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验。更可喜的是，经过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社会中建立控制以来的又一个20年，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去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创新在年轻一代身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些年轻的一代的早期社会化是在一种没有受到过资本主义的或封建秩序影响的社会中进行的。

也许，从这些实验中所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人的本性似乎并不是象马克思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家们所想象的那样易改变，那么容易摆脱增进自我利益的内在倾向。塑造将社会的需要放在个人的需要和愿望之上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其结果是非常令人失望的。道德刺激已被证明赶不上物质刺激。马克思主义的精英者们被迫——或者已经选择

了去创建一种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地类似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业社会中的职业分层体制。

在这一体制中，如同在其它体制中一样，权力的拥有者们享有许许多多的其它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马修斯，1978）。一个有影响的波兰社会学家指出，在这一体制中：

工人仍是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改变工人同机器的关系，也没有改变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他与机器的关系和与工作组织系统的关系要求他服从工厂的领班和经理。他按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而领取工资。并且，他必须服从工作纪律的原则和规定。（兹卡潘斯基，1970，第125页）

根据最近一个对职业声望的研究，在苏联体制和美国体制之间有0.79的相关（特莱曼，1977，表4.1）。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比苏联体制和波兰体制之间所得到的相关还要稍大一些。

并且，这些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波兰社会学家们的其它研究工作告诉我们，（波兰）存在一种双重市场体制。这与美国社会学家最近在美国所发现的双重市场体制明显相似。一个在分层问题上有影响的波兰研究者解释道：

经济当中新的、生产力水平高的和重要的部门（如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通常都是与这些部门中较高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即使在其资格和工作的复杂性上完全一样，一个在纺织厂或食品厂中工作的电工所挣的钱也会少于一个在铸造厂或精炼厂中工作的电工。（维索诺夫斯基，1979，第126页）

最后，应该看到，最近有一个关于波兰社会中收入差异的原因的研究指出，这种差异以工人的性别差异来解释比用其它的单

个因素来解释更为好一些（波霍斯基，1978，也见斯沃弗德，1978年关于苏联社会中妇女收入的研究）。几乎可以肯定，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专家们日趋达到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最好是把这些社会视为一种工业社会的变形，而不是把它看成为按其自我标榜那样的某种新的和独特的社会形式（琼斯，1983）。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说马克思主义精英在东欧所进行的实验一无所获。我在别处提到过（伦斯基，1978），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降低到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业社会中的水平以下这一点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程度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看起来似乎是，对经济不平等的大量限制，只有靠政治上的压制手段才能维持。回顾从第10章到第12章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以及在第2、3、4和13章中关于一般理论的论述，我发现，根据自60年代中期以来从东欧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学到的东西，我几乎没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内容。

我可以做的一个具有理论重要性的修改可能是，补充一个关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存的各种方式，以及如何用这三种成分的不同混合体去解释各个工业社会的差异性的讨论。我在别处曾指出（伦斯基，1984），在资本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财〔产〕分配”；在社会主义子系统中，其指导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按需分配”。这三种原则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都发挥作用。资本收益、股息、房地租、利润和资本家的红利按财产的所有而分配；工资、年薪、佣金则作为对工作表现的报酬而分配；福利支出、食品券、住宅供热支出、失业补贴、残疾人支出、医疗补助、以及收入中转化为社会保障和对老人的医疗

照顾的部分、还有免费的公共教育、进入公园、博物馆和其它公共场所，这些都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从最近的政府资料中判断，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近20%是作为对财产所有的报酬而分配的，70%作为工作报酬，有10%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

在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几乎都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但全人口中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些财产行使着有效的控制，并常常运用这种控制去谋取私利。实际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些社会，指责它们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克里夫，1974，斯威泽和贝特海姆，1971）。总之，这是为什么东欧的社会分层系统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层系统的差别总不如他们所想要做到的那么大的原因之一。我相信，通过直截了当地承认在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中都共同存在有这些分配原则，我们就会更接近于解释在工业社会的这两个子类之间的相似性所造成的表面上矛盾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子系统的相对强度上，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与各农业社会之间因统治者和执政阶级的相对力量所造成的差异相比较（见第254页到263页）。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差异都说明了在一组重要的社会里，分配系统的变量中哪些方面表现出最为重要。

如果有人想要了解关于东欧社会分层的更详细和更新颖的观点，可以阅读下面这些关于这一主题的精彩论著。它们包括梅尔温·马修斯的《苏维埃俄国的阶级和社会》（1972）和《苏联国内的特权：共产主义条件下精英的生活方式研究》（1978）；瓦尔特·康纳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平等：东欧和苏联的等级及变迁》；大卫·莱恩的《社会不平等的结束？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地位和权力》（1982）。在更为通俗化的方面有，赫德里克·史密斯的《俄国人》（1976）。关于东欧

人自己的眼光和观点，可参见诸如安德烈·阿玛尔里克的《向西伯利亚的不情愿的旅行》（1970）；罗依·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2）；维诺兹米尔茨·维索诺夫斯基的《阶级、阶层和权力》（1979）等这样一些多种多样的资料来源。

如果我今天是在重写《权力和特权》一书，那我还将会加上关于第三世界较不发达国家的一章。这一章会有两个中心内容：（1）这些社会在全球分层系统中的位置；（2）这些社会自身内部的不平等系统。

在过去20年中，社会学理论中较为重要的发展之一，是伊曼努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的形成（1974，1980）。在由马克思、列宁和许多提倡依附理论的拉丁美洲学者们所奠定的基础上，华勒斯坦构造了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他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到贫穷看成是第一世界的发达和富裕的必然后果。事实上，他是将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看成是在一个全球分层系统中的参与者。

按照华勒斯坦的看法，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多年来，它一直逐渐地蔓延，到现在，整个世界达到了一个由资本主义竞争原则所控制的单一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欧洲、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一小部分国家控制了大多数的关键性资源，因而享有大多数的利益。在相对立的另一端，大量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许多的亚洲国家却只控制了很少的资源，并受第一类国家的剥削。在这两极之间，还有第三类国家，主要是东亚，但在其它地区也有。这些国家的境况比第二类要优越些，但却远不如第一类那么优越。华勒斯坦和其它一些人把这几类社会分别称作是中心、边缘和半边缘。它们在世界分层体系中的角色和地

位与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新中间阶级的角色和地位是相对应的。

没有哪一个现代世界的观察者能够不承认现代世界经济以及它所带来的分层系统的存在。另一方面，华勒斯坦本人也注意到了，过去500年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然而，他认为（华勒斯坦，1974，第16页），它是第一个没有发展到政治控制的世界经济。

虽然我并不否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独一无二性质，但我将比华勒斯坦更加强调，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已是五千多年以来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甚至自从第一批社会将其首要的维生手段从狩猎和采集转化到园耕上来时，就表现出各社会之间潜在的不平等了。接着，没过多长时间，这种可能性就转化为现实了。一些社会开始实行以牺牲邻国为代价而增进其自身利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案。简言之，我认为，在各个社会之间不平等的最终根源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较晚近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有些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区分，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即使象华勒斯坦所期望会发生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被一场全球性社会主义革命所推翻了，要指望这会带来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时代的结束，也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我们在俄国和中国之间，中国和越南之间，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斗争中，以及俄国同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越南与其卫星国之间的支配关系上所看到的那样，没有理由指望在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中会比在其内部盛行更多的平等与公正。因此，一个成功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也许会改变各社会之间现存不平等系统的性质，但我们不应当指望它会带来社会之间不平等的终结。

假如要我分析全球的不平等系统，那我还得改变对现行系统的解释中的强调重点。如果我是正确地理解了华勒斯坦及其追随者（如契斯敦，1975；罗宾逊，1976）的话，那么他们是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的地位是完全地或至少是首要地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转而决定的。我却认为，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也参与其中起作用，而且这些因素甚至还更重要一些。例如，最近的研究（伦斯基和诺兰，1984）表明，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经济传统比各个社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多地解释了在社会发展上和在最近的经济增长率上的差异。那些在与现代工业社会接触前所实行的是犁耕农业的第三世界国家，比那些接触前使用锄头和掘棍的园耕技术的社会发展得更成功得多。

按照在《权力与特权》一书中所提出的，以及后来在《人类社会》一书的各次版本（1974，1978，1982）中所扩展了的理论来看，这一点几乎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犁耕农业比园耕技术具有更高得多的生产力。它使农业社会可能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就使得在与工业社会真正接触以前，有可能极大地促进劳动分工和更加依赖于货币市场和现金经济。并且使文化水平的更大发展、国家和国家科层机构的增强以及其它一些发展都成为可能。结果，具有犁耕农业传统的现代第三世界社会，与园耕传统的第三世界社会相比，在进入20世纪时，便带来了更多得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资源。

这两类社会在地理上是分开的，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巧合（伦斯基和诺兰，1984）。在世界的温带地区，大多数园耕社会在很早以前就被农业社会取代了。然而，在大部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变迁在发展起现代工业之前都没有可能发生。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指出（1976），在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通常由于有大量成群的和多种多样的微小的侵蚀性生物（即细菌和病毒）的存在，损伤了人口的生命力，杀死了牛和马，而犁耕农业的生产正是依赖于这些东西的，因而这些地区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法默，1968；梅格，1954；沃斯特，1960）。象地中海和北海这样的水路在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以前曾如此大地促进了国际间贸易和商业的发展，而在东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却因缺少这种可以航行的河流和大规模的水路而使其发展受阻。

最近的研究（诺兰，1983）还指出，人口模式上的差异也对社会的经济增长率起到极大的作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一原理。简而言之，我认为，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和世界体系论的鼓吹者们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基础所试图想要解释的东西太多了一些，人们无需贬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有些甚至好象比现代世界经济的影响更为重要。

当我们转向第三世界社会内部所存在的不平等制度时，也有许多值得注意之点。首先，在这些社会中同时存在着前工业化的和工业化的分层系统：这些社会的人口中的某些部分所占据的〔社会〕地位，其权力、特权和声望是建立在旧的社会秩序中的资源的基础之上，而另外某些部分所居之地位，其价值则由从新的、工业化秩序所带来的资源所决定。由于人口中的每一部分都想努力保护和增进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这种情况就常常导致这些社会内部的冲突。

由于我在另外的地方已讨论过了这一主题（伦斯基，1970；伦斯基和伦斯基，1982），所以无需在此重复其细节。只需要说明这样一点就够了，即正处在工业化之中的园耕社会的分层系统与正处在工业化之中的农业社会的分层系统之间，